

# 桂林梅瓶的溯源

谢诗敏 黄华静 车晓 杨潇菟 王杨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541000)

**摘要:** 桂林除了景色秀美的山水以及沉淀深厚的文化而成为名闻天下的旅游名城之外, 还因靖江王陵出土的梅瓶数量众多, 且质地、釉色、品种、造型装饰的丰富多彩而被赞誉为“梅瓶之乡”。遗憾的是对于后者, 目前所知者不多, 尤其是对于梅瓶的溯源方面的认知还存在着很大缺失。本文试从明代大背景出发, 主要就桂林梅瓶的由来、图案和文化等方面作溯源探究。

**关键词:** 明代; 靖江王; 桂林梅瓶; 溯源

## 引言

梅瓶是一种具备储酒、摆设等多种用途的用具。刚出现时, 因其外形如鸡腿而得名“鸡腿瓶”。也有另一种说法是说梅瓶多用来盛一种叫“梅酝”的酒而被称作“梅瓶”。

根据查阅的相关史料, 梅瓶在最初是被当作盛酒用的器具。在宋朝有过一段较长的繁盛期。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比较稳定的条件下, 士人阶级以及民间商业贸易得到了发展, 宋朝时期的酒文化也随之兴盛。因此人们在使用器皿盛酒的时候, 除了考虑其实用性之外也开始注重其美观性。在种种条件的促进下, 梅瓶作为盛酒器具的功能就开始显现出来, 梅瓶的需要性大大提升了。它的这种盛酒器具功能一直持续到了元明时期, 这在许多梅瓶的铭文中都有所反映, 如宋代的梅瓶腹部就写着“清沽美酒”。

随着朝代的更迭, 梅瓶的观赏价值逐渐提高。明朝时期就创造出了十分具有朝代特征的梅瓶, 而后在造型上继续创新。此时的梅瓶开始兼具陈设装饰的功能。瓷器技艺在不断地发展, 梅瓶的器型以及花纹变得越发精致, 由于它的瓶口细长刚好可以插梅枝, 搭配起来相得益彰显得尤为雅致, 文人墨客喜欢用它来插花。这时人们对于梅瓶的需要就由酒具转变为观赏品。

## 一、桂林梅瓶的由来溯源

中国梅瓶的整个发展史可以追溯到唐代甚至有可能更远, 因明朝是桂林梅瓶盛出的关键时期, 我们主要对明朝时期的桂林梅瓶进行研究。桂林曾是靖江王受封的地方, 桂林梅瓶大都在靖江王陵中被发现。《明代靖江王社会地位考》中提及靖江王在首任藩王朱守谦囚死之后被确定为旁支郡王, 其权利与地位均有所下降[1]。靖江王族分落西南, 加上权职不举, 难免会生醉翁之意, 以寻乐消遣。此时, 作为“桂林三宝”之一的三花酒名扬四海, 自然是受到靖江王的喜爱, 而作为盛酒的器具, 梅瓶的需求因此有所增加。

然而桂林本地的所产瓷器很难满足靖江王的品味。当时景德镇所生产的陶瓷工艺品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因此对两地生产梅瓶的条件进行分析。桂林与景德镇同属南方, 均为酸性土壤, 但使用的黏土类型却略有不同。景德镇的瓷器之所以闻名天下, 是因为该地特有的高岭土被称为“瓷业圣土”。高岭土得名于景德镇高岭村, 主要分布在我国华东、中南地区, 该黏土白度极高, 不仅使得烧制出来的瓷器细腻如玉, 甚至也可应用于高档造纸业。而广西多使用一种名为“维罗白泥”的软质高岭土, 属于高岭土中较为优质的一种。但维罗白泥并不集中在桂林, 主要分布在玉林、北海一带, 因此桂林本地难以生产出上等的青花瓷器。

而且就目前的出土信息可知, 桂林梅瓶大都享有“瓷都”美誉的江西景德镇。当时, 广西以海陆两两联合的方式进行对外交通[2], 为景德镇的瓷器提供了入桂的可能。以当时的地理位置, 若要从景德镇烧制好瓷器, 再以陆运的方式将其运到桂林, 山遥路远、车马劳累, 不仅开销巨大且瓷器易碎。因此水运的运输方式最为合理, 既保证运输速度, 又保证运载量。水路运输也是相对最安全最便捷的路线。路线是从景德镇经鄱阳湖, 过洞庭湖, 入长江, 转湘江, 进兴安灵渠, 最后运至漓江。可见, 当时畅通的水路交通为景德镇瓷器能够运达桂林提供了条件。

## 二、桂林梅瓶的图案溯源

明后期的梅瓶器型从辽时期由上而下基本呈“1”字的竖向型, 逐渐转变成胎体厚重、丰肩圆腹的“0”字型, 这也体现了中国人“以圆弧为美”的审美转变。同时连梅瓶的图案也变得越发精致。明朝

不仅是桂林梅瓶多产的朝代, 也是中国宗教文化极其丰富的年代。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 均在这个时期活跃, 皇帝甚至带头崇尚宗教。

宗教的发展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桂林梅瓶的图案发展。影响最大的就是道教。明永乐之后削藩政策加剧, 靖江王受到很大的制约, 不仅不能离开封地, 而且没有实权。既然没有实权, 烦闷情绪自然就需要消遣, 这与道教及时行乐的思想不谋而合。当时一些靖江王还自称仙人, 加上明代皇室对道教的推崇, 桂林梅瓶图案此时便常常绘有八仙、仙人、云鹤、八卦等道教元素。例如, 桂林博物馆所藏的青花八仙梅瓶和青花缠枝莲托八宝八卦纹梅瓶就体现了道教的八仙、八卦和八宝文化。其次, 长期以来保持着至尊地位的儒教同样对桂林梅瓶图案产生影响。同样藏于桂林博物馆的清花“一路清廉”婴戏图梅瓶以白瓷青莲为“一路清廉”的谐音, 用以教育孩童从小树立廉洁思想, 正所谓“儒家倡廉, 廉为政本”。儒家重视道德修养的品格也可以从凤凰、仙鹤、鸳鸯和莺等鸟禽身上得到印证: 如《易中孚》记载的关于鹤鸣与孝敬的关系, 孔雀因有“九德”而被美称为“文明鸟”[3]。梅瓶的花鸟纹样不仅形态生动, 寓意吉祥, 更承载着中国儒教仁义和美德的追求。虽说佛教在明朝同样深受统治者的重视, 但因为佛教反对饮酒, 加上梅瓶是一种酒器, 桂林梅瓶因此就难觅与佛教相关的元素符号了。

## 三、桂林梅瓶的文化溯源

桂林梅瓶反映了明代的中央集权制度文化。为了避免分裂割据混战, 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情况出现, 中央集权制度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所谓中央集权制度是指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密切的政治联系。为维系这种紧密的政治联系, 中央必须要采取严格的手段控制地方。因此, 朱守谦于洪武三年, 被朱元璋封为靖江王, 建藩在桂林。其实际上就是通过分封达成权力的控制和削弱, 是一次宗室内的集权行为。而酒自古以来作为消遣之物, 自然是靖江王因无权力烦闷时的最佳饮品, 梅瓶作为酒具, 自然是伴随着酒的存在而存在, 大量梅瓶在靖江王陵中被发现, 正是靖江王宗室郁郁不得志的证明。同时也侧面印证了明代的中央集权制度文化。

而桂林自古便是名酒之乡, 三花酒已有千年历史, 早在宋代即以“瑞露”之名向朝廷进贡。在这之后桂林更是出现了黄酒、白酒、桂酒等, 尤其是在明朝, 桂林的酒业更是进入黄金期。这就要和上文所说的有关系了, 靖江王在桂林地区只是徒有其名, 实际并无封地和领民, 也无法插手当地的治理, 因此只能寄情于美酒, 美酒自然要配得酒器, 因此靖江王拥有者非常深厚的梅瓶情结, 随之也就诞生了相关的酒文化。

因明代实行藩王制度, 藩王受封在各自的属地, 有自己的子民。在国家权力被分散在各地的情况下, 帝王为了巩固自己政权, 常常将一些名贵物品作为赏赐品赐给宗亲贵族。在明代瓷器盛行的情况下, 而梅瓶作为明代瓷器中的佳品, 自然常常被用来作为赏赐品。作为皇亲贵族的靖江王必然经常获得朝廷的赏赐。因此梅瓶可看作是明代朝廷对地方进行社交时的重要物品, 是一种社交文化。同时, 因明代制瓷工艺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瓷器受到国外贵族的喜爱, 梅瓶作为瓷器中的上品, 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可想而知。东南亚一带沿海国家不时在水下发现载有明代瓷器的古沉船证实了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而对东南亚出口梅瓶时, 采取了水运的方式比较合理的。就桂林的地理位置和靖江王的藩王地位而

(下转第 231 页)

拷问土著人的做法，并私自给上校掳回来的土著人发放食物，最终释放了他们；在老行政长官的心中，他已经做出了其正义的伦理选择，并冒着可能会被帝国警官处罚的危险，让土著人回到了他们的家园。之后，他又遇到了在小镇里乞讨的土著人女孩，他将她带回家悉心照顾，最后还历经艰险，将她送回到她的族人那里。在正义的伦理选择之下，老行政长官积极地帮助土著人，为土著人着想；即使他自己仍处于被囚禁的情境下，他仍想要救助那些被帝国军队俘虏的土著人。正如列维纳斯所说：主体完全将自身置于他者的位置，由此而忘却自身<sup>[4]</sup>。

#### 结语

综上所述，以列维纳斯的他者思想为文学伦理批评的理论支撑，同文学伦理批评实践是契合的。文学伦理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由国内学者聂珍钊开创性地提出和建立，目前仍有很大的理论拓展空间，对于其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有助于文学伦理批评理论的建设与实践方面的发展。而将伦理作为第一哲学的列维纳斯在理论层面上同文学伦理批评息息相关，尤其是其哲学中所涉及的有关他者的思考，使其思想呈现浓厚的伦理道德感。在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中，以显露他人踪迹的面容为基础，到与女性的他者之间的亲密关系——爱欲的讨论，又由这种爱欲走向了标志着“繁衍”和自我“超越”的父子关系，最终由于“第三方”的出现，正义由此建立。可以看到，面容、爱欲、父子关系、正义等核心概念构成了列维纳斯他者思想对文学伦理批评的理论框架；从他者伦理的角度与立场解读、阐释作品，分析文学作品中主要人物的伦理觉醒、伦理禁忌、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探索其中的伦理内涵与伦理价值，正是以列维纳斯他者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文学伦理批评实践的意义所在。

#### 参考文献：

- [1] 孟彦文. 勒维纳斯对形而上学和存在论的区分[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4): 82-85.
- [2] 李荣. 列维纳斯他者视阈中的伦理主体[J]. 学术研究. 2011(8): 20-25.

[3] 林华敏. 从隔离的自我到异质性的他人: 论列维纳斯的绝对伦理[D]. 南京大学, 2012.

[4] 王嘉军. 列维纳斯思想中的文学和艺术及其文学批评意义[J].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9, 10(04): 96-108.

[5]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5): 16-24.

[6] Levinas E.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M].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1979.

[7] 李喆. 从存在到他者: 勒维纳斯伦理学的形上跃迁[D].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8] 林莉. 从“自我”到“他者”——石黑一雄小说的伦理觉醒[J]. 内蒙古电大学刊. 2019(04): 37-41.

[9] 列维纳斯. 从存在到存在者 [M]. 吴蕙仪, 译. 苏州: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10] 孙向晨. 从“爱欲”到政治——论莱维纳斯“爱欲现象学”的多重意涵[J]. 江苏社会科学. 2007(06): 21-27.

[11] 黄瑜. 他者的境域: 列维纳斯伦理形而上学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J]. 外国文学研究. 2010, 32(01): 12-22.

[13] Levinas E. Time and the other and additional essays[J]. 1987.

[14] 高宣扬. 论列维纳斯伦理学的新形而上学意义[J]. 道德与文明. 2017(01): 23-32.

[15] 林华敏. 从邻人到第三方政治——论列维纳斯的“伦理-正义”的同构性与困境[J]. 现代哲学. 2021(02): 106-112.

作者简介: 丁蔓, 女, 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文学哲学和诠释学; 任禹霏,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文学哲学。

#### (上接第 226 页)

言, 靖江王作为进行梅瓶外交时的重要负责人是有着极大可能的。此时, 梅瓶作为对外贸易的商品, 就具有外交功能, 也就具有一定的社交文化。同时, 收藏在桂林博物馆内的“携酒寻芳”的梅瓶也可说明梅瓶的社交文化。该梅瓶腹部图案为一位文官骑着高头大马, 慢行在山水之间, 马前有一位童子携琴引路, 马后是一个仆人肩担一只盛酒的梅瓶。因此根据此梅瓶的名称“携酒寻芳”和其图案可得知, 梅瓶装酒也是一种社交文化。

梅瓶还具有祈福寓意的文化。靖江王及其宗室藩属崇尚梅瓶, 他们生前生活奢华, 爱用梅瓶装酒, 死后仍然想要保持着自己的荣华富贵, 希望通过用梅瓶来陪葬。梅瓶因而不仅具有丧葬价值, 也有祝福葬者在冥间平安的祈福价值。另外桂林博物馆还藏有一件出土于明墓的本地民窑生产的陶梅瓶, 其肩部雕刻着“天长地久”四字, “天长地久”本身就带有祈福爱情能够幸福长久或统治可以稳定传承之意。

据明代墓葬制度可得知, 桂林梅瓶象征着一种身份文化。明后期, 梅瓶的外观不断进步发展, 许多皇族对梅瓶的需求扩大。我们熟知的靖江王就是梅瓶爱好者的典型, 甚至将其带到了自己的陵墓中。桂林曾经是靖江王府被宋明王朝分封的地方, 先后有 14 位藩王死后葬于靖江王陵。靖江王陵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好、最完整的明代藩王墓群, 有“岭南地区第一陵”之称。共有明朝历代靖江王墓 11 座, 妃子、将军、中尉及氏族墓地 300 余座。桂林梅瓶大都在这些墓地中被发现。明朝的梅瓶作为一种“风水瓶”, 是皇帝、皇后、皇妃、公主和其他皇子及受封的郡王所专门可以用来随葬的物品。因此皇亲贵族在丧葬上也形成了攀比之风, 通过陪葬品的多少, 来彰显自己地位的高低, 因此将名贵的梅瓶作为自己的随葬品。在明代的随葬制度中, 即使是朝廷中的一、二品大员, 只要他不是皇族, 其墓葬中就不能有梅瓶随葬。而靖江王作为受封的藩王, 自然是有梅

瓶随葬。在桂林, 现今只有靖江王陵出土了众多的梅瓶, 其余地方没有梅瓶的出现, 也是体现了靖江王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因此说桂林梅瓶体现了一种身份象征的文化。

#### 四、结语

历史的脚步不曾停歇, 桂林靖江王陵出土的梅瓶更是成为了世人研究历史的珍贵文物。我们需要通过出土的梅瓶去研究更多有效的历史信息, 进一步地贴近梅瓶历史, 从而溯源其背后的文化。更是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了解历史发现美的途径。桂林“甲天下”的并非只有山水, 桂林出土的梅瓶以其永恒的魅力, 高尚的艺术品位, 精湛的工艺水平, 独特的人文价值, 展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是桂林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一道亮丽的彩虹。梅瓶文化与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且相互贯通。本文通过对桂林梅瓶溯源的浅析, 旨在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梅瓶的文化及艺术价值, 试将梅瓶溯源进行传承推广。

#### 参考文献：

- [1] 张子模, 邹长清. 明代靖江王社会地位考[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02): 91-97.
- [2] 廖红标. 明清时期广西对外交通发展研究[D]. 广西民族大学, 2010.
- [3] 曾祥忠, 易仕敏. 靖江王国与梅瓶[J]. 南方文物, 2000(04): 72-75.
- [4] 郑银河. 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与儒家精神[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12): 60-61.

谢诗敏 (2000-) 女, 汉, 本科,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贵港人, 在读本科大学生, 日语专业

2021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项目编号 S20211059521